

# 身体改造与认同的困境

## ——晚清民国时期的剪发研究

童敏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南京 210031)

**摘要:**剪发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身体进行外在改造的手段之一,它的出现与时局的转换紧密相关。从性别上看,男性剪发运动是在民族主义的潜流中向西方身体话语靠拢的结果;女性剪发运动借鉴了男性剪发的成功实践,在五四女性解放的呼声达到高潮,并随后裂变出革命与摩登的双重含义。剪发后的男女面临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困境,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即出现了“假洋鬼子”与“花木兰”两类文学形象。这两类文学形象隐含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心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男性剪发;女性剪发;身体改造;认同困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5-0028-06

剪发运动自晚清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较高的政治舆论关注度。笔者在梳理资料时发现,关于剪发的研究存在着性别上的区隔。男性剪发与女性剪发是两件前后相依又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而学界目前尚未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中作并置研究。男性剪发担负着救亡、强国的时代重任,最终却只沦为了西方身体话语形式的躯壳;五四时期女性剪发在女性解放、男女平权的呼声达到高潮,但其参照系却是男性。在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剪发后的男女群体都落入了认同困境的窠臼。

### 一、民族主义潜流中的男性剪发

头发本不应当成为一个政治话题,但有清一代,男性的发辫却关乎满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满清入关后便开始推行“薙发令”。“开国之初就以辫、服立国,将蓄辫、著满服做为汉人臣服满洲统治的标志,并以此做为维系满洲力量、巩固清室统治的重要手段。”<sup>[1]</sup>本属于身体一部分的头发成了政治象征物,普通百姓剃发留辫的行为则表达了他们对满清政权的臣服和归顺。如此,剃发留辫和蓄发剪辫就成了一组对立的政治问题。太平天国时期,起义军蓄发,回归汉族传统发式便是一种政治反抗行为。

晚清时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发辫再次成为政治焦点。此时,剪辫与否承载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曾作《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上书光绪帝。虽然康有为在此次上书中将“断发”“易服”与“改元”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一提法却是在保存清王朝政治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剪辫、易服等手段,在身体形式上塑造“新民”,继而达到强国的目的。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不同的是,革命派赋予剪辫以排满的含义。随着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相继剪去发辫,呼吁剪辫言论中的排满情绪日益强烈。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sup>[2]</sup><sup>25</sup>1911年《申报》上的一篇《劝剪辫歌》更是指出:“留此豚尾形,肩背何龌龊。二百六八年,大为中国辱。”<sup>[3]</sup>其实经过时间的冲刷,有清一代的汉人已逐渐忘却辫子是臣服满清统治的象征了。所以鲁迅先生才会说,“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正经人了”<sup>[4]</sup><sup>193</sup>。此时,革命派重提剪辫,无疑是将汉人早已尘封的身体记忆重新唤醒,这样剪辫就与排满、光复大汉划上了等号。“今大汉光复,普天率土,无不自剪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文学中的都市声景研究”(2021SJA0735)

作者简介:童敏(1988—),女,安徽舒城人,文学博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

其辫,改为新民。”<sup>[5]294</sup> 革命派将满人定义为“非我族类”,那么发辫就成为是否服膺满人统治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辫子的有无成了革命与否的身体标识。可以说,在身体形式上,剪辫成为了与清政府统治进行切割的标志。

晚清革命派推行的剪辫运动还牵涉到“华洋之别”。如果说对内,剪辫意味着排满,那么对外,剪辫则意味着文明。对西方人而言,发辫是识别中国人最重要的身体标志,是他们想象中国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中国人的辫子在西方语境中,被译为带有贬义的“pigtail”,梳着辫子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丑陋的、愚笨的、落后的、迂腐的,他们理应被戏谑、被嘲讽,被贬低。“外人对中国的蔑视,必然反映为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蔑视。而这个中国人最突出的形象特征,就是一根 Pig-tail。”<sup>[6]</sup> 鲁迅也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说:“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sup>[7]432</sup> 身处异域的中国人更能感受到发辫所带来的困扰与屈辱。1866年,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赴欧洲游历,在法国便有人将留辫子的青年男性误认作女性。“出门,有乡愚男妇数人,问德善曰:‘此何国人也?’善曰:‘中华人也。’又曰:‘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善笑曰:‘皆男子也。’”<sup>[8]481</sup> 王韬在旅欧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拖着长辫的王韬被欧洲小儿问到是否为“载尼礼地”(即 Chinese lady),是否为同行詹五的“威孚”(即 wife),这对本是“一雄奇男子”的王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王韬愤慨道:“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詎非终身之讖语哉!”<sup>[9]133-134</sup> 由辫子引发的“性别尴尬”时常发生在留学生身上。1906年,《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辫子给留学生带来的不便。外国人见到要么直呼“豚尾”,要么就问是男还是女<sup>[10]</sup>。本为堂堂须眉,却被误认为巾帼,留着长辫的中国男性陷入“另类”的性别焦虑中。于是乎,中国男性在西方这个“他者”眼光的凝视下,有被“阴性化”的危险,青年男性应有的阳刚气质被一根发辫削弱了。在西方文化的认知中,有辫子的中国男性是被“阉割”的。

相比于西方国家,日本对待中国人发辫的态

度更加刺痛了国人。1871年,日本颁布了“散发脱刀令”,这意味着日本人可以剪去长发,不随身携带佩刀。曾经,日本在冠服制度上仿汉制,在近代,日本由汉制转向西化,这是对本国传统的否定,也是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背弃。英文“Pigtail”的含义在日本文化中逐渐定型为带有侮辱性的词汇“豚尾”,专指中国人的辫子<sup>[6]</sup>。“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这种嘲弄。”<sup>[11]184-185</sup> 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开头对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的发辫有过精彩描写。这些留学生将辫子盘于头顶,藏于帽内,正是为了规避发辫、豚尾与中国人的身份三者之间的联系。

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亟待剪去长辫的晚清中国人,并未在辫子剪去之后恢复汉族传统发式,而是向西方现代发式靠拢。对此,李永东表示:“尽管发式的改变属于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但最终并未回归汉族的传统发式,而是以西方的现代发式来置换满清发式。如此,剪辫在半殖民地中国除了关联着革命造反,也意味着对西方身体话语的认同。”<sup>[12]</sup> 晚清中国对内面临着深重的满汉矛盾,对外承受着西洋武力和西洋文明的双重冲击,内外交困的时代环境“刺激出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潜流”<sup>[13]3</sup>。在满、汉与西洋的多重文化压力叠加中,中国人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而晚清中国的男性发辫就在这重重危机的时代中承担了这一重要任务。在西方身体话语的引导和塑造下,中国人以短发洋装取代了长辫长袍。

## 二、动态话语建构中的女性剪发

在男性剪辫的社会热潮中,女性的身体则以“戒缠足”这一话题走进了大众的讨论话题。这是因为,女人的小脚和男人的发辫一样,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粕糟体现在女性身体上的外在标识。晚清以后,缠足被扯掉“莲步之美”的虚伪外衣。郑观应曾说:“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sup>[14]288</sup> 鲁迅在日本仙台求医时,也曾因藤野先生问及中国女人的裹脚问题而感到难堪。相比之下,女子剪发当然显得无足轻重。

女子剪发运动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在反映五四的文学作品中,短发是新女性身体的最重要的标识。如巴金《家》中的张蕴华、许倩如,茅盾《虹》中的梅女士、徐绮君。鲁迅在反映五四的短

篇小说《伤逝》中,并未展示子君的短发形象或提到子君有剪发的冲动,然而在姚有信连环画版的《伤逝》中,子君便是一头标准的短发。可见,短发作为五四新女性的身体标识,已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五四运动中,中国女性作为一个集体登上历史的舞台,“开始了她们从物体、客体、非主体走向主体的成长过程”<sup>[15]</sup><sup>32</sup>,剪去长发是她们获得自我主体性至关重要的身体实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传统的观点来说,女性的头发表征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和审美凝视。诸如青丝、云鬓等雅称均出自于男性文人之手,诗人白居易就曾以“云鬓花颜金步摇”描绘出杨贵妃娇媚的体态。当时有反对女子剪发的人认为:“天赋的青丝发,剪下失去了天然之美。”<sup>[16]</sup>还有人认为女性“剪了发,云是散了,香是消了!与云散香消的女性睡在一起,你看,你嗅觉,你把捉,完全像你的同性”<sup>[17]</sup><sup>240</sup>。赞成女子剪发的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反对的人,多是主张女子要讲求‘美观’,做他们的玩物,称他们心意的人,所以用美观两字来作反对的理由。”<sup>[18]</sup>正因为女性头发特殊的文化寓意,所以剪发才成为五四时期女性表达自我意识觉醒和寻求男女平权重要的身体标识。

女性剪发在五四时期成为与婚姻、恋爱、参政、社交、教育、贞操等并列的妇女问题之一<sup>[19]</sup>,可见这一话题在当时所具有的舆论热潮属性。而女学生就是在这股热潮中,站在先锋位置的那个群体。1920年3月,《民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女子剪发应当从上海的女学生开始<sup>[20]</sup>。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曾回忆到,五四时还是学生的她与王剑虹等人为剪发而作的斗争<sup>[21]</sup><sup>262-263</sup>。在当时的成都,女子剪发先“从益州女学、蓉城女校、女子实业学校的几个女生”开始,“接着响应的女生渐渐多了”<sup>[22]</sup><sup>138</sup>。此外,南昌、长沙、济南、苏州等地的女学生也对剪发运动作出了积极响应。

当然,五四时期如火如荼的女性剪发运动并非开展得一帆风顺,来自保守派的质疑与反对是女性剪发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上海大同学院拒绝剪发女生入学<sup>[23]</sup>,苏州女师校长让已剪发的女生戴上假发,甚至勒令这些剪发女生退学<sup>[24]</sup>。许钦文之妹许羨芬因剪发而被北京女高拒收,鲁迅得知后愤慨道:“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sup>[25]</sup><sup>260-261</sup>可见,以女性解

放、男女平权为口号的女子剪发运动在五四时期尚未被整个社会所接纳。这种情况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的女性剪发纠缠于革命与摩登两类话语中。

1927年大革命期间,剪发在这一时期被看作是女革命者的身体特征。《晨报》在1927年发文《妇女剪发表现革命精神》,称头发对于女子来说是无用之物,还平添诸多不便,应当“革”去。“近顷且以短发为新女子之唯一符号……吾等所贵乎革命者,为革除无益之事。凡无益而有损者,皆在革除之列。妇女头发亦其一也。”<sup>[26]</sup>既然“女子剪发=革命”,那么只要在革命军北伐成功的地方,女性都需要剪掉头发。于是乎,“女性剪发”成了检验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青天白日旗所至之处。一般头脑稍新,知识开通之女子,莫不纷纷将发剪去。”<sup>[27]</sup>洪北平1928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剪发的故事》一文,文章开头便说妻子剪了头发,乃是“革命军北伐成功的结果”<sup>[28]</sup>。女子剪发既具有革命性也具有摩登性。在国民大革命的中心武汉,短发借助革命的力量流行开来。1927年《中央副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革命”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武汉“革命”有被摩登化的趋势。作者说:“在现在革命潮流高涨的中国,尤其是在这革命中心的武汉,好像人人都革命化了;好像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其思想行动,都通通革命化了。”<sup>[29]</sup>“革命”本是高于日常的行为,一旦落入凡俗,以至人人都追捧的时候,“革命”便走向了摩登。作为象征女革命者的剪发/短发,最终成了人人追捧的“时尚”。因此有学者论道:“当它(剪发)被普通妇女接受时,却是因为‘时尚’‘流行’和‘审美’的需要,革命的意义在慢慢消解。”<sup>[30]</sup><sup>112</sup>当时的电影明星如黎明暉、胡蝶等均以短发形象出现在广告牌、杂志封面、电影等公共媒介之中。当短发成为一种审美而流行开来,也就意味着它逐步获得了大众的认可。正如陈望道所言:“有人从审美上主张剪发,剪发的现象才会得普及起来。”<sup>[31]</sup>

与男子剪发相比,女子剪发与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关。同时,女子剪发在欧美国家无实例可鉴,想从西方身体话语中寻找可供参考的“他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五四男女平权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只能以效法男性剪发的方式找寻自我身体改造的合法性。“近日我国盛唱男女平等,女子服装,自宜效法男人,剪发之说,大可倡

行”<sup>[32]</sup>。还有论者认为,“剪发”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制度不良,造成男女不平等。“‘穿衣’‘剪发’也是制度的一种,如果男女装饰十分歧异,恐怕与我们改造社会的目的要生出许多障碍来。”<sup>[33]</sup>当时,女性的个人意识觉醒,她们认为辛亥时期倡导男性剪发的同时女性剪发未能受到重视,是因男女的境况不同,因而未能改良。但现时,女性的地位得到改善,“男人能做的事女人没有不能的”<sup>[34]</sup>。也即是说,五四前后,女性剪发从男性剪发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观照自我身体的参照物。

### 三、认同的困境:“假洋鬼子”与“花木兰”

在近代中国,剪发对于两性来说都是向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告别。但新的身体却充满了各种悖论,造成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在西方这个“他者”的凝视下,中国男性剪去发辫,穿上西装,从身体形式上拉近了与西方的距离。然而,这个新的身体却不能获得国人的一致认同。他成了一个“假洋鬼子”。五四女性是在晚清民初男性剪发成功实践的启发下,基于男女平权的时代主题,剪去了长发。当女性以男性剪发为参照物时,女性也就陷入了“花木兰”式的困境。“假洋鬼子”和“花木兰”指向两性剪发后造成的自我认同的危机。

“假洋鬼子”是晚清民国文学中常见的一类文学形象。“假洋鬼子”是西化得不彻底的中国人,是中国急于突破近代困境的产物。他们既无法在中国人中找到立足之地,又不可能归属于洋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假洋鬼子”呈现出了“杂交”的特征。“辫子”是辨别“假洋鬼子”的身份标识。在谈到辫子与“假洋鬼子”的关系时,李永东认为,“辫子的文化喻义并非指向‘满汉的界限’,而是指向‘华洋之别’,是中外民族身份的确证,也是鉴别新旧人物的身体符号”<sup>[12]</sup>。晚清推行的“剪辫易服”或是“剪辫放足”运动都是向西方身体话语靠拢的体现。但这让保守的中国人会心生一种危机感:“我中国人如剪发易服不几成为外国人乎。”<sup>[35]</sup>“假洋鬼子”之“假”首先体现为普通民众,尤其是保守派和底层民众对近代文化的隔膜。《阿Q正传》中,钱大少爷在阿Q眼中就是一个“假洋鬼子”。如果我们站在阿Q的视角,会觉得钱大少爷并非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叙事者对钱大少爷的介绍却是这样的:进过洋学堂,到过东洋留学,半年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sup>[25]521</sup>。可见,钱大少爷接受了近

代文化的洗礼,已经脱胎换骨,改变了原本奴颜婢膝的身体形态,成为了一个“新人”。对钱大少爷这个人物的理解,如果站在阿Q的“传统视角”往往会产生“误读”。晚清小说《中国现在记》中的劳二瘸子也是一个“假洋鬼子”式的人物。当热心科举功名的朱侍郎看到劳二瘸子剃掉了辫子,留着二三寸的短发出现时,他便认定劳二瘸子要造反,并告诫道:“一条鞭子不要看得轻,外不忠于君,内不孝于亲,就在这条辫子上!”<sup>[36]3</sup>此外,鲁迅笔下的N先生(《头发的故事》)、李劫人笔下的楚子材(《大波》)都属此列。

“假洋鬼子”之“假”还在于主体本身内心对这个新身份的不确定。在《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在饱受“无辫之灾”后,当学生问他是否要剪发时,他的回答是:“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sup>[25]487</sup>这种犹疑可能是那个时代随波逐流的剪辫男子的共同心声。剪辫子就意味着与传统身份的彻底决裂,但当他们以这个“新身体”试图融入到中国社会时,竟在这个纠葛着诸多悖论的社会中找不到归属,还会被贴上“里通外国”<sup>[4]194</sup>、“要到外国去当奸细”<sup>[36]3</sup>的标签。最终,只能选择妥协,通过一根“假辫子”回归到传统身体,才有可能被社会接受。鲁迅自述,他在日本把辫子剪了后,回到上海花了四元大洋装了一条假辫子,戴了一个多月<sup>[4]194</sup>。曾被称之为“赘疣”的辫子,此时却成为庇护主体本身的“护身符”。这种悖论正暗示着“假洋鬼子”在面对文化身份认同时的困境。

“假洋鬼子”之所以会产生认同困境,乃是因为“辫子”只是一种形式变革,它与主体的内在精神有可能并不同步。民国初年,在一部徽商自传小说中,主人公“我”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剪去了辫子,家中祖母反而向我祝贺,“道以后可以青云直上”。“我”本人也感到是喜事一件,“愿此后头衔改换,出色当行,可以荣妻,可以荫子,可以封诰及泉壤,可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文章事业,彪炳当时,学问功名,表扬后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岁虚掷韶光,空抛驹隙,庶不负生平之所期许焉”<sup>[5]296</sup>。如此看来,本来象征着民主共和的剪辫,在普通民众眼中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罢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都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辫子有关,看似是“旧事重提”,但这并非是鲁迅的本意。他是想从“回忆”与“忘却”的辩证法<sup>[37]</sup>中表现启蒙的深意。这启蒙既是启蒙大众,又是知识

分子自我启蒙。在身体解放与精神觉醒同步的情况下,“假洋鬼子”们所面临的认同困境才有可能消失。

当男性在剪辮之后落入“假洋鬼子”的文化认同困境中时,剪了发的女性同样也陷入了性别认同的困境。头发对女性来说不仅塑造着自我躯体,也是区分两性的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女性剪发参照系是男性,此时,头发失去了区分两性的功能。《令禁女子剪发》一文认为“男女有别,装饰有制,本所以明人伦,端风化”。女子剪发潮流只会造成风俗日坏,“几无复男女之分”。同时这篇文章再一次强调“剪发之令实仅限于男子”<sup>[38]</sup>。《顺天时报》曾刊登过一篇《剪发女子》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时小姐以短发长衫骗过学校的舍监,混入男生寝室与男友私会。并认为这就是她“剪发的至大理由”<sup>[39]</sup>。如此看来,最初的剪发女性只能是陷入了“安能辨我是雄雌”的“花木兰”式困境。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中,剪发成了“花木兰”式的女性必备的身体特征。女革命者们在参加革命之前都需剪去头发,才能献身于革命。剪发意味着放弃女性身份,只有这样才能像“男人”一样走进公共领域,获得革命群体的承认。茅盾《虹》中的徐绮君,是一个剪了短发有点男人气质的女性。“黑而柔软的短发从中间对分,很整齐地披在两边,掩住了半只耳朵”,“具有男性的可敬而又可畏的气势”<sup>[40]</sup><sup>37</sup>。谢冰莹入伍当天,男性教官给她们的指令是脸上的脂粉要洗干净,不留一丝痕迹,头发要剪短,甚至剃光,“像我们一样”<sup>[41]</sup><sup>73</sup>。“花木兰”式的女性也能激发男性对女性的情欲想象。短发的女性有着别样的迷人风姿。短发代替长发成为这一时期男性情欲幻想的新象征。且不说新感觉派作家笔下那些极具诱惑力的短发女郎,革命文学中短发的女革命者也同样有着魅惑人心的力量。茅盾笔下的孙舞阳就是一例。她不仅有“剪短的黑发”,还有“血红的嘴唇”,“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纤细的伶俐的脚踝”,“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sup>[42]</sup><sup>168</sup>。有学者评价这类女性道:“既承载着魔鬼式的诱惑、欲望,又最终皈依革命真理正道。”<sup>[43]</sup>“花木兰”式的女性身体在革命文学的表达策略中极具革命文学的“特色”。

头发在近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不容忽视的。从清初的“薙发令”开始,

到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男性剪发运动,再到五四运动时期至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剪发运动,“头发的故事”总是与历史的发展保持线性的一致性。头发的剪与留本是个人自由,但是一旦以政令或暴力对头发的去留问题进行限制,身体便无法避免政治对其的规训。男子剪发是在晚清民族主义的潜流中,向西方身体话语靠拢的结果。晚清中国经过不同层次的话语转换,社会之进步、国家之富强、民族之壮大的宏大目标最终落于男性的发辮上,男性剪发因而成了中国人走向近代化的起点。于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女子剪发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性别之战,它的出现表明女性正努力从传统的性别秩序中挣脱出来。但女性剪发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是在大革命时期至30年代。此时,剪发的女性是革命的,也是摩登的。由此看来,剪发关乎的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在近现代化的潮流中与不同权力话语的斡旋、协商后的身体改造。

改造后的新身体面临着认同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在文学书写中出现两类“新人”:“假洋鬼子”与“花木兰”。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映射。研究“假洋鬼子”与“花木兰”并不只是回顾历史,而是希冀通过这样的研究去探寻历史发展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容。

### 参考文献:

- [1] 樊学庆. “剪发易服”与晚清立宪困局(1909—1910)[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0(3).
- [2] 邹容. 革命军[M]. 上海: 民智书局, 1928.
- [3] 劝剪辮歌[N]. 申报, 1911-12-17.
- [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詹鸣铎. 我之小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 [6] 施爱东. 从pigtail到“豚尾奴”: 一个辱华词汇的递进式东渐[J]. 民族艺术, 2010(4).
- [7]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8] 张德彝. 航海述奇[M]//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9] 王韬. 漫游随录[M]//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0] 剪辮论[N]. 大公报, 1906-10-31.
- [11]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儒谦, 林启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12] 李永东. 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03).

- [13] 葛兆光. 本无畛域——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M]//葛兆光. 本无畛域.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 [14] 郑观应. 女教[M]//夏东元. 郑观应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5]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6] 对于骂女子剪发的赠言[N]. 大公报,1928-07-28.
- [17] 叶圣陶. 李太太的头发[M]//中国现代文学馆. 叶圣陶文集.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18] 我对于女子剪发的意见[J]. 新女子,1922(1).
- [19] 梅生. 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M]. 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
- [20] 上海的女学生注意[N]. 民国日报,1920-03-31.
- [21] 丁玲. 丁玲全集:第5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22] 张秀熟.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运动回忆录.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 [23] 为拒绝剪发女生质大同学院院长(未完)[N].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1-10-05.
- [24] 苏州女师底剪发潮[N]. 民国日报·觉悟,1921-02-15.
- [25]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6] 妇女剪发表现革命精神[N]. 晨报,1927-08-07.
- [27] 女子剪发琐闻[N]. 申报,1927-04-28.
- [28] 洪北平. 剪发的故事[J]. 文学周报,1929(326-350)。
- [29] “革命”问题[N]. 中央副刊,1926-06-30.
- [30] 张莉.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前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 [31] 陈望道. 中国女子底觉醒[J]. 新女性,1926(9).
- [32] 女子剪发打油诗[N]. 大公报,1920-05-03.
- [33] 女子剪发与服装的讨论[N]. 民国日报,1920-04-10.
- [34] 论妇女们应该剪头发[N]. 晨报,1919-12-05.
- [35] 答客问剪发易服事[N]. 大公报,1904-09-25.
- [36] 李伯元. 中国现在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 [37] 符杰祥. “忘却”的辩证法——鲁迅的启蒙之“梦”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J]. 学术月刊,2016(12).
- [38] 令禁女子剪发[N]. 大公报,1926-10-01.
- [39] 剪发女子[N]. 顺天时报,1927-01-01.
- [40] 茅盾. 茅盾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1] 谢冰莹. 谢冰莹文集(上)[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42] 茅盾. 茅盾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3] 张武军. “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J]. 文学评论,2015(1).

## Body Modification and Identity Dilemma: Research on Hairc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NG Min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ircut has been a means of external body modif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the male haircut movement was the result of approaching the western body discourse in the undercurrent of nationalism. The female haircut movement learned from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male haircut. It reached a climax in the voice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n split into the dual meanings of revolution and modernity. After the haircut, the male and female faced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culture and status,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two kinds of literary images: “imitation foreign devils” and “Hua Mulan” in literary creation. They implied the special cultural mentalit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embodied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le haircut; female haircut; body modification; identity dilemma

(责任编辑 雪 箫)